

## 怀念父亲庄少萍

燕南 2022.4.28



这些日子不是一些特殊的日子，但年过八十的我常常想起他--我们苦难的，死于73年前的，37岁的父亲。

想起蔡港。他跟人家喝酒，我哭着，被一个慈祥的奶奶抱着。我哭个不停，她塞给我一个玉制的小茶壶。那时我大概是四五岁吧。然后他带我去紫泥大沙洲村。他在那里办了一个“华生农场”。农场的围墙装饰着红军帽的五角星。他带我去学游泳，在一条小水沟。他站在水沟上，用绳子绑着我的腰，拖着学游泳。晚上，他带着长枪抱我爬上一个高高的碉堡，用木梯子。然后，他把梯子收起，把闸门关上。

他在石码新行街开了一家水果店“华生水果行”，里面有一箩筐一箩筐的芦柑。他还在龙溪县的榜山至江东、紫泥岛一带组织“江东抗日游击队”，进行抗日宣传和串联，筹建武装队伍以迎击日寇可能入侵内地。期间曾率人到已被日本人占领的厦门、鼓浪屿活动并张贴标语。他还曾经带回一把日本关东刀，我在老家浸水埕楼上的楼梯闸门后面见过它。

记得爸爸打过我。六七岁时，大人给我钱叫我去买肥皂。到了街上，看到二舅舅守德坐在一条长条板凳上跟卖肥皂的摊贩在聊天。听说我要买肥皂，他们就给我肥皂，不要我的钱。我就拿这钱到另一个摊点买了一辆手指大小的铁皮做的小汽车。回到家里，爸爸听我说出经过，马上用劈柴刀的厚背把小汽车砸成一团，从天井里扔到远远的屋顶上去，然后狠狠打我屁股。叔叔过来把我高高抱起，祖母围着护着我把爸爸挡开。那一天晚上，爸爸说不让我进去睡觉，妈妈就在客厅里边打毛线边陪我。后来，她进去看看，说爸爸睡了，才把我带进去。第二天，妈妈又悄悄带我去“园圈”的一家店铺，买了同样的一辆小汽车给我。爸爸随后去了香港。不久给我寄来一支玩具枪，金属的，可打连发的纸质弹药。同时，他寄来一辆大型的玩具车，人可以坐在车里踩动的。我人还太小，家门口的路面又坑坑洼洼，所以得有人帮推车。谢谢你，爸爸。

在香港时，爸爸寄来很多“革命”的书籍。我记得有老毛的《论新民主主义》和描述苏联儿童幸福生活的期刊。那里的儿童有自己的游戏室。想必那是爸爸希望给我们的东西。

1949年，爸爸奉派从香港来厦门迎接解放，叫我们去厦门。从石码去厦门要坐汽船沿九龙江到大海。遇到满潮又顺流时，两个小时可以到。遇到低潮又逆流时，三个小时还不一定到。汽船是官话，闽南方言叫“电船”。它是木头船体，靠柴油机为动力，上下两层，客仓在底仓，约可载客30人。座位是木头长排凳，中间两条长排凳背靠背，靠窗的沿船体一圈。船仓里，大部分人都抽自卷的土烟。柴油机轰鸣震耳，人们没办法用正常声音说话。快到厦门时有一个三角形海域，风浪特大，整条船抛上抛下。会晕船的人开始呕吐，拼命把头伸到船舱外。幸好，船头一转，鼓浪屿出现，厦门到了。

儿时，厦门就是大城市大地方的象征了。水汽里，烟雾中，楼房扑面而来，给八岁的我一份莫名的激动。汽船慢慢靠上码头。防护栏杆外面悬挂着球状的防止船体碰撞的藤蓝。那个时代汽车少，



所以护栏用藤蓝而不是旧轮胎。在厦门，载客的是二轮人力车（如左图）。妈妈雇了一辆这样的二轮人力车去爸爸住宿的旅社。在海口那条路上，人力车的轮轴突然断了，把我、弟弟和妈妈及行李摔了一地。到了旅社以后，妈妈跟爸爸谈起路上的遭遇。“你有算工钱给人家吗？”爸爸问。妈妈说：“人摔了不计较就很好了，怎么还给钱？”

爸爸批评了妈妈，说没给车资人家怎么修车，怎么生活？后来，爸爸也批评了我，因为我管旅社的工友叫奴隶。我所以这么叫，是因为在我读过的童话书里，仆人都叫奴隶的。

我读过的童话书里还有一则故事，说一个孩子屡次被后母骗到树林里去扔掉。聪明的孩子第一次放石子作记号，第二次放树枝，都顺利回来。第三次放豆子，却被小动物把豆子吃掉了。旅社是二层楼，我们住在朝海的房间。那个晚上我久久不敢入睡，生怕爸爸妈妈夜里从沿街窗户用绳子溜下去，抛下我和小弟弟。当然，爸爸妈妈没有抛弃我们。他们带我们来厦门是为了租个房子，合家在一起。那是厦门解放前夕，风声鹤唳。如果带家眷，特别有小孩，租房不会引人注目，也无需铺保。到厦门第二天，我们就在草埔巷租了间房子住下。

租的房子是郑静庵（即郑静安）伯伯介绍的。我记得他来看爸爸，两人西装革履，站在租屋门口矮矮的屋檐下谈话。长大以后我才知道，静庵伯当时是厦门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秘书。（解放后，他当了福建省农工民主党的省秘书长，文革中被害致死。）静庵伯在家乡当校长时，爸爸是学生。草埔巷这所租屋的旁边有一片空地。上面常有一些洋垃圾，包括空的罐头壳。我找了铁钉用砖头在罐头壳打两个洞，繫上麻绳，带着弟弟踩在脚下踏着走。我的另外的一个玩乐是去街上小人书店看书。有一次我走远了，认不出回草埔巷的巷子口。摸摸袋里还有一枚硬币，就当街拦下一辆人力车，雇他送我回到草埔巷的巷子口。

妈妈曾回忆到在草埔巷的日子。她说，因为爸爸离家太久，我的四岁的弟弟根本不认识他，既不让他进房间，更不让他上床。好容易等孩子睡了，爸爸才上床，却又被孩子摸到痒处，笑出声来，一下子又被弟弟赶下床，并推出房间。爸爸只得在客厅里，微笑地等到孩子熟睡。我们跟爸爸妈妈一家四人的温馨日子，才一个多月就被打碎了。那一天，爸爸没有回家。妈妈坐立不安，一连打破三个饭碗。第二天两个便衣来。我记得他们打开大衣橱上下搜查的样子。便衣带来五元光洋和爸爸的一张字条，上面写道：“船过三天就要航行，你要带好孩子。”（见下面妈妈信的扫描。“驾驶证”应为“船员证”之误）妈妈知道是出事了，三天后要被枪毙。爸爸是让妈妈赶快带孩子回石码。否则，如把母子也抓去陪审怎么是好。妈妈当即跟房东太太联系。房东的儿子雇车把我们送到船码头，妈妈把一瓶派克牌墨水送给他。

49年7月你父突然来厦，曾我此你兄弟去厦行居住。一个多月后，你父那天下午要去厦大开会，出门后又转回来探亲一次，就再没有回来。第三天特务此五个良元给我说，要你父的驾驶证，并一纸条说：三天后要回海，教我此好孩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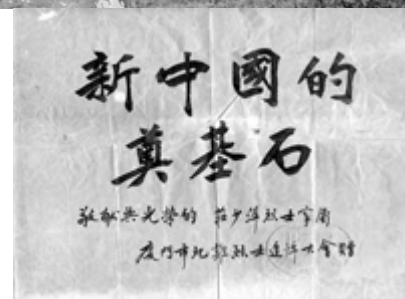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当天回石码的最后一班船，到石码的时候天色都已经很黑了。第二天清晨，枪声四处响起。我跟阿嬷（奶奶）推开家里的大门往外看，一个持枪的警察一边跑一边喊：“共军来了！”那一天是1949年9月20日。（后来，石码镇一条叫炮仔街的街道就改名叫九二零。）解放军攻到了石码，厦门跟石码的交通断绝了。我们也从此见不到爸爸。



1949年10月17日厦门解放次日，耗信经爸爸狱中难友（厦门清白摄影社陈姓）传来。当时商船还没通，妈妈就在舅舅和叔叔的陪同下雇小船去厦门。在厦门第二监狱，妈妈见到了爸爸的临时坟墓（见右图）。妈妈回忆说，她自1939年与爸爸结婚，九年中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合起来不超过两年。其中连女儿生病、夭折，他都在不在妈妈身旁。在香港时，他来信提到生活的艰辛，内战的苦难，并说到为了孩子的未来，为了民族和大多数人的幸福，他准备牺牲自己，回来迎解放。如今，解放是迎来了，但我们从此再也见不到爸爸。



厦门市召开了厦门死难烈士追悼会，给我们发了表彰状（见右图）和抚恤金“边币”四千多元（时值750块银元）。回到石码，妈妈曾经试探叔叔和舅舅，看他们是否愿意收下抚恤金，喂养我和弟弟。但除了妈妈，谁都把八岁的我和四岁的弟弟当累赘。除了妈妈，没有人把我们当金山银山。跟姑婆一样，妈妈也怕下乡，特别怕睡觉的地方没有干净的枕头和被褥。但她别无选择，只能去工作，好喂养我和弟弟。当然，我们从来不是孤独无助的。在弟弟一两岁我五六岁的时候，妈妈曾问我，如果她突然死了怎么办？我面不改色，胸有成竹地回答：我才拿上饼桶和剪刀，带弟弟去阿嬷家。饼桶呢，装着弟弟吃的饼干。但那盖子很紧，要用剪刀才撬得开。阿嬷家（外婆家）呢，是当然去处，唯一去处。



没有父亲的家，是个破碎的空壳子。我们家二楼楼梯口的栅门跟墙壁脱榫了。前厅通阳台的地板常年雨水浸透，烂了。阳台上天窗的一个砖头松动漏水，长年累月，终于整片屋顶塌了。夏天想去江边游水，没有人保护。希望有一把木头枪，希望有一个滚地铁圈，希望有一副可以做弹弓的橡皮筋，希望有一支带胶粒的乒乓球拍，都成了不可及的奢望。爸爸去世后，我就不曾买过任何玩具。我的三舅母给人家做衣服有许多空线轴。我把它用绳子穿成一串，在脚下兜左兜右，跳起跳落，倒也乐此不疲。我们当时都穿木屐。我用铁钉和铁片把算盘珠子钉在木屐的两侧当滑冰鞋，结果让弟弟的脚割出血。后来，去修理铺讨来断锯片钉在木屐底下，夜间在宛南亭（见右图）的水泥路上滑走，得意地跑出一串串火花。



谨以此文纪念我们亲爱的爸爸和妈妈，以及我和弟弟的贫穷但快活的童年。